

聊城大学
博士文库

魏三休石經

古文辑证

○ 赵立伟 著

Studies on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of
SANTISHIJING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魏三休石經

古文辨証

◎ 魏三休 著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H. Halliday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中華書局出版



聊城大学博士文库

魏三体石经 古文辑证

Studies on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of SANTISHIJING

◆ 赵立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三体石经古文辑证/赵立伟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9

(聊城大学博士文库)

ISBN 978-7-80230-791-9

I. 魏... II. 赵... III. 石经-古文字-研究-中国
IV. H121 K87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1346 号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宗旨与具体目标	1
第二节 本课题的研究历史及现状	5
第三节 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	15
 第一章 三体石经源流考述	19
第一节 三体石经概述	19
第二节 三体石经的劫难与变迁	28
第三节 三体石经的发现与著录	30
第四节 三体石经古文的整理与辑录	47
 第二章 三体石经篆隶构形特点及篆隶与 古文的比较	187
第一节 石经小篆的构形特点	187
第二节 三体石经隶书的构形特点	195
第三节 三体石经篆隶与古文用字比较研究	201



第四节	三体石经篆隶与古文用字差异产生原因试析 ——从古本《尚书》、《春秋》在汉魏的 传承谈起	206
第三章	三体石经古文构形与用字研究	212
第一节	石经古文的来源	212
第二节	“科斗文”与石经古文的形体	218
第三节	三体石经古文的构形特点	224
第四节	三体石经古文用字现象考察	232
第四章	三体石经古文疏证（上）	237
第一节	字形简化的石经古文	239
第二节	字形繁化的石经古文	249
第三节	更换偏旁的石经古文	257
第五章	三体石经古文疏证（下）	276
第一节	笔势变异的石经古文	276
第二节	形体讹变的石经古文	288
第三节	以隶作古的石经古文	301
附	石经“乱”、“会”古文构形新解	309
第六章	三体石经与今本《尚书》、《春秋》 异文比较	314
第一节	三体石经与今本《尚书》、《春秋》 异文举例（上）	316

第二节 三体石经与今本《尚书》、《春秋》	
异文举例（下）	333
结 语	343
参考文献	348
后 记	364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宗旨与具体目标

传抄古文一般是指在历史上发现后屡经辗转抄写并流传于后代的战国文字，主要包括《说文》古文、三体石经古文、《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以及保存在各类古代字书中的隶古定古文。另外，20世纪敦煌所出卫觊改字之前的古文《尚书》中也保存了一批丰富的隶古定古文资料。^① 这些古文的存在形式并不相同，然而它们均是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下被收集整理并流传下来的古文字资料，由汉代起历经二千余年沧桑直到今天，其中相当一部分古文形体竟然和出土的古文字吻合无间，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战国文字研究的学者而言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然而历史上学者们对传抄古文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由东汉到清代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传抄古文罕有知音，甚至曾一度被认为是“杜撰的古字”；^② 直至清末民初，才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传抄古文与六国文字之间的联系。首先强调六国文字即“古文”

① 林志强：《古本〈尚书〉文字研究》，中山大学2003届博士学位论文。

②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济南：齐鲁书社，1981，第39~40页。



的学者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率先利用“二重证据法”，证明传抄古文一系的材料与战国文字为“一家之眷属”。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他列举大量的战国文字与《说文》古文、石经古文相互印证，得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种文字自为一系，又与昔人所传壁中书为一系”的结论。^①同时，他还注意利用传抄古文考释战国文字，在这一领域内颇有创获，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战国文字研究的水平。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土战国文字无论从数量还是范围上都远远超过前代。随着战国文字研究的不断深入，王氏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印证，传抄古文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对其进行再整理与再研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学者在整理中山王诸器时就认为：“今天对《汗简》一书似有重新估价的必要。”^②曾宪通师在论述传抄古文与出土战国古文字的关系时更进一步指出：“要探讨古文一系的文字，有赖于战国文字的发现与研究，而要解开战国文字中某些难解之谜，也离不开古文资料的研究与运用。”^③李学勤先生也指出：“我觉得我们应该全面研究历史上有关‘古文’之学的文献，研究前辈学者整理孔壁中经、汲冢竹书等等古文材料的有关经验，特别是注意《说文》中的古文、奇字和正始石经的很多字……正始石经的很多字可以说与楚简上的字完全一样。这些材料的重要性还有待进一步认识。”^④何

① 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观堂集林》（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82~185页。

② 张颌：《〈中山王诸器文字编〉序》，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③ 曾宪通：《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合证》，《古文字研究》（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73~287页。

④ 李学勤：《上海“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讲话》，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第1~2页。

琳仪先生在论及传抄古文时则侧重谈了在利用这些古文材料时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他说：“对待传抄古文除了必须考释其真伪，剔除其讹变因素之外；还要撇开音训、义训的纠葛，才能拿来使用。只有善于缜密地分析传抄古文形体，与未知的战国文字比较，才能发挥其字典的作用。”^① 诸位先生充分肯定了传抄古文在古文字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同时也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些古文材料指明了方向。我们认为以出土古文字材料补证传抄古文与利用这些材料考释出土古文字是并不矛盾的，相反，两种研究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只有利用出土古文字材料对传抄古文加以验证，才能吸取其合理因素，剔除其讹变因素，从而真正做到“对这些材料有真切的理解，有区别地加以对待，有条件地加以运用”^②。同时，只有以这种客观科学的态度分析利用传抄古文，才能真正发挥它们在战国文字考释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至于指鹿为马、张冠李戴。

魏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等性质相同的古文材料相比，其点画的准确度更高，可靠性更大，上可证《说文》古文，下可证《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曾宪通师早就指出：“《说文》古文中有部分形体诡异，不知所从，既不合于六书要求，又无法从同期或前期古文字中得到印证，但有些却可以从石经古文中探知其讹变之所由。”^③ 不仅如此，后世的一些传抄古文材料，甚至包括某些隶古定古文的形体也可以借助石经古文找到其来源，其中相当一部分石经古文更是与出土古文字的

①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第286页。

② 曾宪通：《论〈汗简〉古文之是非得失》，《曾宪通学术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第429~434页。

③ 曾宪通：《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合证》，《古文字研究（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73~287页。



形体吻合无间。因此，与其他同类材料相比，石经古文的价值显得更加珍贵。遗憾的是历史上发现的石经古文材料仅在《隶续》、《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中有零星保留，清季和民国出土的石经残石除少数得以妥善保存外大部分早已散佚，即使是残石拓本也难以保全。孙海波虽倾力收集，然其《魏三字石经集录》一书所收材料仍有遗漏，因此连他自己也认为：“统计新出石经残字，所收尚不过什八。”^①在石经古文研究方面，由于当时出土战国古文字材料不多，因此诸家把石经古文的比照对象大都仅限定在商周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就是主张传抄古文与战国文字为“一家之眷属”的王国维也未能免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许多珍贵的古文字材料得以重见天日，这为我们系统研究石经古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出土的石经残石拓本在大陆和日本又有零星发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陕西西安曾先后两次出土三体石经残石，虽然残石上刻写的字数有限，然而这些新出土的石经残石却在三体石经研究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战国文字研究不断深入、各种研究条件相对成熟的今天，为了充分发挥石经古文在战国文字研究中的作用，很有必要对历代传抄和出土的石经古文材料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同时也很有必要利用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对这些石经古文进行全面的疏证，而这些正是本文要努力去完成的工作。具体说来，我们准备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1) 全面收集整理石经古文并按照《说文》收字为其排序，然后利用字表的形式将石经古文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出土古文字材料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石经古文的真

^① 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台湾：艺文印书馆，1975。

伪及其可信度进行客观的评价。

(2) 在完成目标一的基础上,利用古文字材料特别是新出土的战国文字对那些形体讹变不知所从的石经古文进行详细疏证。具体说来就是把这些古文置于各自的发展序列中去考察,通过排比大量的古文字形,推求石经古文的来源,追溯古文形体演变或讹变的过程,并尝试总结石经古文形变的规律及得失。

(3) 从字形结构和文字体势两个方面入手全面总结石经古文的构形特点,探讨石经古文在构形上与战国古文字及传抄古文的关系,对石经古文中一字异体、文字假借等特殊用字现象进行详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石经古文区别于同类传抄古文的独特之处。

(4) 除熹平石经外,三体石经是目前所见到最早的《尚书》、《春秋》经写本,虽然刊立的时间比熹平石经稍晚,但一字三体的特殊书写格式却使其在《尚书》、《春秋》二经早期写本研究中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与传世本互校,其可供校正今本《尚书》、《春秋》者甚多。我们拟采用石经三体文字形体比较研究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对石经古篆隶三种写本的性质进行考察,进而对其中的部分异文进行详细讨论。

第二节 本课题的研究历史及现状

历代三体石经的研究可分为唐宋、清末民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个时期,虽然各时期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致不外集拓残石、考镜源流、立其碑图、题跋拓本、编纂字典及文字研究几个方面。下面我们分期分类对历代三体石经的研究状况进行介绍。



一 宋及清代对“开元十三纸”的研究

三体石经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经开了题跋石经拓本的先河，郭忠恕《汗简》卷七《略叙》云：

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得三字《春秋》，臣仪缝石经，面题云“臣钟绍京一十三纸”，又有“开元字印”、“翰林院印”……至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知书楼直官贺幽奇、刘逸己等检校，内寺伯宋游瓌、掖庭令茹兰芳跋状尾焉。其真本即太子宾客致仕马胤孙家藏之，周显德中，嗣太子借其本，传写在焉。^①

文中谈到的“十三纸”就是著名的唐开元十三纸，其中的古文因《汗简》、《古文四声韵》、《隶续》三书得以部分保留下来，殆三家所见均为毁弃之余的摹本，而且各本的存留情况互不相同，因此各家收字往往存在有无、多寡的不同（关于它们的详细比较，可参见黄锡全先生《〈汗简〉、〈古文四声韵〉所录石经“古文”与出土石经、〈隶续〉所录石经古文对照表》）^②。另外有关石经古文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这三部书中，其中《汗简》卷七《略叙》集宋以前有关传抄古文记载之大成，为我们研究宋代以前古文的发现及流传情况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隶续》不仅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文材料，而且洪适在《魏三体石经左传遗

①（宋）郭忠恕：《汗简》，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 黄锡全：《〈汗简〉、〈古文四声韵〉中之石经、〈说文〉“古文”的研究》，《古文字研究（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2。

字》的跋语中针对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常被时人混淆的情况首次辨明“一字遗经为汉刻”，并认为出现这种混淆的原因是“范蔚宗时，三体石经与熹平所镌并列于学官，故史笔误书其事，后人袭其讹错，或不见石刻无以考正，赵氏虽以一字为中郎所书而未尝见三体者，欧阳氏以三体为汉碑而未尝见一字者”^①。

元明以降，除陈彦里、赵殿撰两家略收残拓之外，魏三体石经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有清一代，统治者多方笼络文人，奖掖学术，学风日盛，经学重新得到学者的重视，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三体石经又重新走进了人们视线。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石经残石墨拓的搜求，“有清北平孙氏退谷、江都马氏秋玉、丹徒蔡氏松原、邹平张氏，各藏残本墨拓，钱梅溪于书麓得双构残本及玲珑诸拓，递转抚刻，珍若鸿宝”^②。二是对三体石经源流的考证，主要有万斯同、徐铉庆两家，^③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成绩都无法超出前人。三是对宋代著录石经古文的研究，主要有臧琳、孙星衍、马国翰、冯登府四家，^④诸家均对《隶续》所录《春秋左传遗

① (宋)洪适：《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311页。

② 王献唐：《汉魏石经残字叙》，济南：山东省立图书馆，民国23年（1934年）。

③ 万斯同：《汉魏石经考》，《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④ (清)徐铉庆：《石经考〔缩微制品〕一卷，备考七卷》，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3。

(清)臧琳：《经义杂记》，《臧氏拜经堂》，清乾隆嘉庆间（1736～1795）。

(清)孙星衍：《魏三体石经遗字考》，平津馆丛书。

(清)马国翰：《三字石经尚书、三字石经春秋》，《玉函山房辑佚书》，《长沙榔嬛馆》，1883，第63页。

(清)冯登府：《石经补考（十二卷）》，《八年续刻本》，清道光二年（1822年）。



字》中混乱杂错的《尚书》、《春秋》文字依据其文本顺序作了重新调整，从而使其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对于石经中的断章残句则依今本文字补出，使其文句相连、文意顺畅通达。唯臧、马重在经义的考察，故对于石经文字“一依旧本以《尚书》全文注明之，笔画有讹缺者亦未敢遽改”；孙、冯两家则侧重于文字的考订，其中孙书重在石经文字与《说文》、《汗简》、《古文四声韵》及传统经传的相互比较与发明，在比较过程中纠正前者字形之讹误，补充后者记载之不足。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孙书对某些古文构形的解释亦颇为允当，如以𠄎为虞之借字、释𠄎从民从思省从心等。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几成不刊之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氏能做到这一步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冯书比孙书后出，作者除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孙氏的做法之外，颇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冯氏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了出土古文字与石经古文的比较，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早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石经古文的著作；另外该书又专立一卷对《汗简》所录石经古文遗字依《说文》的收字顺序进行了重新整理，其中部分古文下还附有作者考证该字形的简短按语。

二 清末民初对洛阳所出石经残石的研究

这一时期三体石经曾有过两次发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于洛阳龙虎滩得三体石经《尚书·君奭》残石；民国11年（1922年）于洛阳城东30里的朱圪塔村出土石经《尚书》、《春秋》残石。因两次石经出土的时间间隔较近，而且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石经研究有许多共通之处，所以本节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这一时期的石经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成果上都是前代所无法企及的。

资料的及时整理与刊布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关于这一时期石经拓本的著录情况因下文有关章节还要详细介绍，此略而不述。考订源流成绩卓著者主要有罗振玉、王国维、杭世骏、吴维孝、章太炎、王献唐、张国淦、孙海波等。罗振玉在光绪年间石经残石出土后不久便亲自赶往洛阳出重金搜求残石拓本，并率先将拓本影印公之于众。另外，罗氏于石经拓本的跋语中还记录了有关此次石经出土的许多细节，为研究石经出土的历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材料；在1922年石经第二次出土之后，罗氏又有《魏正始石经残字陈氏景本跋》问世。

王国维关于魏三体石经研究的论著主要有两部，即《魏石经考》和《魏正始石经残石考》。《魏石经考》最初刊布于《广仓学窘丛书》中，^①该书共分两卷，卷上包括汉石经经数考、魏石经经数考、汉魏石经碑数考、魏石经古拓本考、魏石经经文考、魏石经篇题考六个部分，卷下分为魏石经古文考、魏石经书法考两个部分。《魏石经考》后来被王氏择要收入其自编文集《观堂集林》中。据王氏的学生赵万里回忆，作者在编辑《观堂集林》时“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弘旨者，悉淘去不存。旧作如《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亦仅存一部分而已”^②。经过王氏严格筛选之后，《观堂集林》中的《魏石经考》仅包括魏石经碑数考、经数考、石经祖述之版本考、石经拓本考及古文书法考五个部分。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广仓学窘丛书》所收两卷本《魏石经考》除上述所列内容之外，还附有王氏为《隶续》录《春秋左传遗字》所作

① 王国维：《魏石经考》，《广仓学窘丛书》，上海：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民国5年（1916年），第5册。

② 李学勤：《〈观堂集林〉前言》，《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的碑图。与其他碑图不同的是，王氏碑图所使用的文字均采自洪适《隶续》卷四所录三体石经摹刻本《春秋左传遗字》，碑图中的文字或仅存一体，或存两体，或古篆隶三体同时并存，洪适《隶续》摹刻本不收的字则付诸阙如。与一般用楷书所作的石经碑图相比，这种碑图更加形象，因而也更加接近石经的原貌，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历代石经的各种碑图中，王氏的这种做法是绝无仅有的。遗憾的是王氏在选编《观堂集林》时并没有将这一碑图同时收录，在王氏的所有著作中，这一碑图仅见于20世纪初刊行的《广仓学窘丛书》中，一般读者很难见到。王氏另一著作《魏正始石经残石考》包括序言、碑图、经文同异、古文考证四个部分，其中最值得称道者当属第四文字考证部分。另外该书最后还附有以楷书书写的《隶释所录魏石经碑图》。^①今天看来，王氏关于三体石经研究的成果不仅远远超出前人之上，即使是同时代的学者甚至后人也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王国维之后又有章太炎、王献唐、张国淦、孙海波等均曾论及石经源流，他们虽无法超越王国维但特征依然鲜明。其中章氏对邯郸淳的生平考证甚详，对后汉古文经流传情况的考证亦颇有发现。^②王氏则着重介绍了元明清三代石经拓本的流传情况，虽讨论颇为简略，但元明清三代石经拓本的流传却是他人所未曾提及的。^③张国淦《历代石经考》虽然发明不多，但因

① 王国维：《魏正始石经残石考》，《王国维遗书（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② 章太炎：《新出三体石经考》，《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511～512页。

③ 王献唐：《汉魏石经残字叙》，济南：山东省立图书馆，民国23年（1934年）。